

建五的风格

○林贤光（教）



2025年4月26日，林贤光老师参加建五毕业60周年聚会并讲话

2025年，建五班毕业60年了。当年20岁出头的小兄弟姐妹们，如今都已年过八旬。我今年93岁，苟活至今，虽有不尽沧桑之感，但是，看到建五班仍能几十位同窗好友欢聚一堂，共叙友情，自是十分高兴，白头翁妪回忆华年，难得，难得！

我1953年天津大学毕业后，分配来清华当助教，教画法几何和阴影透视。到1963年接替崔克摄先生做建五班的班主任。那时，你们已经是大学三年级，崔先生和你们共处三年多，骤然被调离清华，我也是很突然地被黄报青先生约谈，让我接任。当时，我不敢接，我说：“我一个群众，不是党员团员，怎么能当班主任？”黄先生说：“这是经过组织上讨论的，让你干，你就干，是信得过你才让你去干的。至于思想政治工作有辅导员、团支部去做，你只要把学生的日常教学事情安排好就行了。”就这样，我接受了班主任这个工作，走马上任。

那时，我教建筑系每一届一年级的画

法几何和阴影透视，同时又在学校的基建会上班，参加关肇邨、殷一和、高亦兰先生领导的主楼和校内工程的设计工作。

在接任了建五的班主任之后，系总支书记李德耀先生曾找我谈了一次话，指出了建五班的问题要注意自由主义，我又找了辅导员单德启先生和建五三个班的团支部书记了解了一下班上的情况，到同学宿舍去了几趟。说实在的，我除了在建五才入学的一年级时，给大家上了一年的课以外，对建五毫无接触也毫无了解，同学的名字都记不住几个。从这时开始，我担任建五的班主任一直到1965年，把建五班送到毕业。

说实在的，我对建五，就班主任这个工作来说，我做得不好。一方面是我还有课要上，基建会的活要干，也不知道班主任应当怎么做。但是更主要的是，我自忖不是党员团员，政治上很怕犯错误，缩手缩脚，反正许多重要的决策性的工作都有辅导员和党团组织去做了，用不着我操心，在组织上做出了决定之后通知我，我忠实地执行落实就是了，仅此而已。

和同学们的接触，我也是缩手缩脚，反右才过去几年很怕犯“政治性错误”，小心翼翼。但是，终究在一些问题上自己也必须表态。建五这个班又确实是有许多同学很有个性，尽管有时乖张一些，但也是年轻人的常态，应当保护，不必大加鞭挞。那时，我和建五同学直接参与的主要活动，一个是1964年暑期在京西宾馆的实习，另一个是当年秋季建筑系开展的“建

筑思想批判和讨论”。

1964年暑期，建五部分同学在京西宾馆进行工长实习，同学们表现出和解放军工程部队工人极大的亲和力，实习结束时和也在该工地实习的建七班举办了一场联欢会，热闹非凡。

1964年11月，在系里开展的“建筑思想批判和讨论”，主要是在建筑设计思想方面批判形式主义崇洋崇古，建五作为毕业班成了重点。是以学术批判方式，讨论为主，是比较和风细雨的，我作为班主任自然参加了讨论。先是同学，后是教师，都是批洋批古。其实，批了几个星期也没批透，最后草草收兵，不了了之。

1964年下半年，建五同学进入毕业设计阶段。同学们被分配到几个工程设计组进行毕业设计，一部分到重新启动的主楼设计，一部分到新开辟的左家庄小区的规划和住宅设计，另外一些人去了绵阳的651清华分校工程。我那时也从基建会调到左家庄设计组，建五有一批同学参加了

左家庄的预制大板住宅设计，我在该项工程中负责两栋现砌的房屋设计，分配给了我四个同学：孔力行、侯世荣、蒋钟埏和伍文玮。我和他们共处了半年多，在接触中看到了这几位同学的优点。孔力行似乎具有天生的组织才能，身为同学的组长，把设计组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与相邻工种配合得十分融洽。侯世荣思想缜密，处理多方面的关系极为妥帖。两位女同学都极为纯真，蒋钟埏非常单纯，愿意和人谈心，伍文玮则沉默寡言比较内向。几个同学虽然性格不同，却都努力上进。

那时，左家庄的重点在预制大板的住宅群，我们的现砌组不是重点，而这几位同学却无怨无悔，也不去和大板组的同学比高比低，安心地做好我们的现砌工程，仅就这一点就非常难得了。到了1965年，又有十几位同学来到我这一组。当时，朱自煊先生将垂杨柳的一座烂尾住宅楼给了我们，这十来个同学在极短的时间里把这个甩掉了两三年的烂摊子结束了，以上使



1965年7月28日，林贤光先生（前排右6）与建五在校同学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得我对建五的同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建五班的同学是一批非常淳朴、天真、极具个性、十分可爱的年轻人。有时不是很“听话”，但又是非常“出活”。自由奔放，但是绝不出格，奋发有为，天天向上，很可爱的一个集体。那时，有人似乎更喜欢“老实听话”的班级，对于建五认为是“大毛病不出，小毛病不断”，于是认为是班上自由主义泛滥，不好管。但是，也就是这个班，集体抱团，全面发展，多次获得了集体荣誉，毕业时有36人入党，15人跟着蒋南翔校长到永年“四清”，班上数十人参加了学校的文艺社团，十余人进入校体育代表队。毕业后，且不说班上同学中出了几位部长级的领导干部和院士，就大家在毕业后从事的设计单位来说，担任行政和技术领导骨干的就数不过来。说建五人才“倍”出一点都不过分。

建五何以能够如此？我在《班门弄斧三集》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这个班1959年入学，1965年毕业，前未赶上反右，后未沾上“文革”，班上基本上没有受到激烈政治运动的冲击，所以从班史上看没有受到内伤，没出现过人斗人和类似的伤害。这应当说是赶上了好的天时。这在那个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时期是极为难得的。

再者，我对单德启老师在《读建五班陆强同志〈回忆〉一文感言》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当时对学生的思想管理上执行了一个“宽”的原则，我非常

赞赏。也就是对同学中出现的一些“自由主义”的现象（实际上往往是一些个性的表达），采取了宽容的措施，适当地加以引导，而不是斗争或扼杀。这一点使得多数同学的独特能力和品质得以发挥。这一点，在建五同学走上工作岗位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单先生说：“宽松的成长环境，宽容的人际关系，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宽泛的学习领域，就是重点在引导同学们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优化自己的思想能力和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单先生很精彩地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话：“什么是教育？当你离开学校以后，把老师们的堂堂讲课都忘了，把那些课本教材都忘了，还剩下的东西，那就是教育。”真精彩啊！有鉴于单先生引用了这一段话，我联想到我们的建五同学，你们毕业60年了，生动地验证了单先生在文章最后指出的：在一切都忘记了之后留下来的是什么？是人的自我成长。在这方面的的确确我不及单先生认识得如此深邃，正是这样的宽松条件扶植了建五同学们的“自我成长”。



2019年林贤光先生（前排左5）出席建五同学聚会

第三，这几天，我又重读了《班门弄斧集》和《清华建五纪事》，再一次回顾了同学们从毕业到退休的历程。深深感到这个“自我成长”的过程，极其清晰地展现在每位同学乃至我们建五这个集体中间。

建五同学毕业时分配到十几个不同的领域部门工作，加上以后随着世态的变化，特别是到了十年浩劫之后，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再分配、再创业，乃至走上完全非原来预期的事业，而我们一个个同学都能做到事业有成，绩效突出，成为不同岗位上的骨干，乃至成为一方的领军人物。这一点绝非偶然。正是体现了前面因素的效果。不仅如此，就建五这个集体而言，成员虽然处在不同领域的全国各处，但是，作为建五这个集体却一直没有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学间亲密的友情一直维系着，尽管每个成员都已年过古稀，但是，“建五”这个班，仍旧存在着，它似一株长青树，依然枝繁叶茂，依然挺然屹立。这一点十分难得，我在清华七十多年，没见到过一个班集体能够维系得如此长久、如此紧密，青山常在，友谊长存。

从一件小事看，建五班编写的《清华大学建五班通讯录》，从1979年编的第一本，以后屡次更新，到2014年，我收到的就有七个版本。仅就这件事来说，就是班上有那么一些有心人，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在做这样一件无声无息、任劳任怨的事。

我在清华建筑系教一年级的课五十年、几十个班，却没有一个班像建五班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作为一个完整的集体而活力无尽地存在并积极开展活动的。这说明了这个班的内在凝聚力有多么强，

同学彼此之间的友谊有多么深。今年校庆，《通讯录》又出了2025版，这可真是好消息。

回想到当年和你们共处的两年多，我还记得许多同学间的轶事。像陈尚义的苏州园林报告、韩江陵的“玫瑰与剑”、应朝去买大皮鞋而缺席了实习的动员会、刘海泉与黄报青先生关于简体字的争论，以及在“建筑思想批判”中对几座西方标志性的现代建筑批判又批不动等等情节，尽管已经过了几十年，我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把这些记忆与几十年后再看到的陈尚义的《宝石上的皇冠》，韩江陵的两本《龙凤山人诗集》，应朝的《三字诗》以及多种形式的杂文，再加上数不尽的同学们的著作，像马国馨，院士、总建、会长多重身份在身，竟能在百忙中著作等身，甚至还能参加业余的艺友合唱团，难矣哉！

推而广之，建五的能人不少：叶如棠、白福恩、高寿荃、马国馨、林桔洲、吴塾瑶等的书法；绘画就不必提了，学建筑岂有不能画的，但尤为突出的如韩光煦、杜文光这样专业水平的也不少见；高寿荃在楹联领域已是高峰档次；喜欢治印的人不少，张思浩、马国馨、应朝都有相当水平；能诗的人不少，除了韩江陵诗人外，还有像从建一班转来的吴庆麟也爱写诗，吴亭莉夫妇还出了诗集；吴亭莉还活跃在歌唱的舞台上；何维增出了关于建筑摄影的专书；叶如棠、宋春华、袁镜夫妇的摄影集也都出了好几辑；还有黄邦杰的小说，等等。这仅仅是建五部分同学业余爱好的冰山一角，但从如此广泛的业余爱好之间可以看到同学们个性的发展。至于大家在不同专业、不同领域方面的专业成

就，就不必在此赘言了。总之，建五是一个英才“倍”出的集体，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是认认真真地做事，认认真真地把事做好，而且力求做得好上加好。追求卓越，这是清华的风格，也是建五班的风格。

我还想到，那几位英年早逝的同学，像才华横溢的应朝、功在保护古城的王景慧、事业有成的林丙棠、老实憨厚的张增贵、名门世家的张允冲、十项全能运动健将殷亘龄，特别是较早病逝的蒋钟埏，1984年去世的时候才42岁。这位曾在毕业设计时与我相处半年多的女同学，那么单纯、憨厚，竟然成为班上较早离世的同学。在马国馨推荐我看《蒋天枢传》之后，我才知道蒋钟埏患病之后的情况，我落了泪，惋惜这位早走的好同学，也后悔我没有能够参加她的告别。此外，先我远行的同学还有：诸耀明、黎旺秋、范玉庆、朱治安、王崇礼、陈尚义、罗玉阁、胡正凡、周美培。我会永远记住这些名字。我想，如果真是有一个天国的话，有一个应朝在那里，加上一个陈尚义，那里的建五班会还能开得起。

毕业60年还能开得起几十人的班会，太难得了。就我自己而言，我自忖愧为你们的“班主任”，和同学们的交往我不及崔克摄，和同学们思想的深入我不及单德启，于德于才我也不及班上的每一位同

学，更谈不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个师范的最高标准，我还差得很远很远。

但是，建五的同学们并没有忘记了我，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十年浩劫、我历经困难之后，我收到的第一封信，竟是建五的姚娟娟寄来的，关心我的情况，询问我的安危。而应朝、黎旺秋生前每年必有一张贺卡寄给我，孔力行更是对我关怀备至，时有信来。马国馨知我爱书，每有新作必定寄我一本，这些虽然都是些许关怀，却都使我感激不尽，牢记在心。很简单，同学们没有忘记了我。特别是在我年老之后，觉得有人还惦记着我，这总是高兴的。

至今，我在清华建筑系已逾70年，在建筑系里，我也仅仅是普通一兵，但却曾和如此优秀的建五班集体建立了友谊，实在是平生中一件最幸福的事。能够和这样一些好同学交往了几十年，回想起来，对自己当年的“班主任”工作没能做得更好，真是有愧于当年组织上和同学们的信任 and 希望。反思起来，我除了比同学们略长几岁之外，谈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忝为“兄长”而已。故此，作为家常的心里话和弟弟妹妹们交交心，谈一点心中想说的话，都是自己人，没有什么顾忌，坦然面对。

大家都过了80岁了，你们当学生的时候才20岁出头，我30岁，就似乎比你们大了许多。到了现在呢，你们80岁，我90岁，好像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了。人生如此，我想，就我贸然充当你们的大哥，想也许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祝大家，我的弟弟妹妹们健健康康，家庭幸福，平安吉祥，快乐常在！让“建五”这面旗帜一直飘扬下去。



○张思浩（1965届建筑）篆刻